

论宋亡“诗史”

方 勇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宋末士子在经历了空前的鼎革动乱之后,对杜甫“诗史”精神有了比唐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在艺术形式方面,他们对杜甫“诗史”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汪元量主要用联章组诗手法创作出来的宋亡“诗史”长卷,舒岳祥主要用以序代题手法创作出来的反映宋末元初东南沿海地区动乱现实的“诗史”巨卷,则更成了我国“诗史”发展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关键词] 宋亡诗史;联章组诗;以序代题

[中图分类号] I207.209;K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1)03-0025-07

On the Poems Reflecting the Perishing of the Song Dynasty

FANG Y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06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y experienced the prodigious Reform Turbulence, the Song scholars had a more profound awareness of the Spirit of the historical poems of Du Fu than the people in the Tang dynasty. Furthermore, they made a breakthrough and developed from the historic poems of Du Fu in the aspect of artistic style. Among them, Wang Yuan-liang and Shu Yue-xiang were most outstanding. Wang used the technique of combining poems into articles to create the episodes of the poems reflecting the perishing of the Song dynasty; while Shu used the technique of replacing the subjects with prefaces, to reflect the turmoil happening in the south-east areas along the coast during the end of So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works of them became the two mileston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poems.

Key words: the poems reflecting the perishing of the Song dynasty; combine poems into articles; replace the subjects with prefaces

南宋后期,“诸贤高谈性命,其次不过驰骛于竿牍俳谐场屋破碎之文以随时悦俗,无有肯以诗为事者。”^[1]但由于蒙古铁骑的突如其来和科举制度的完全废弃,江南士子们便得以彻底告别时文而与对偶声韵日趋亲近,使诗歌成了他们抒泄民族悲愤和个体幽怨的最佳载体。而且,此时他们对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也有了严格的选择。何梦桂在《永嘉林霁山诗序》中说:“穷于诗之变而有感焉。方庠序群居,高谈阔论,不过颂‘猗那’,歌《清庙》,诵《鱼丽》、《天保》、《鳧鬣》、《既醉》之什,变风变雅,不忍言之矣;况复齿及魏、晋、梁、陈以下穷苦愁怨等语,如细夫嫠人、羁旅寡妇之为者!相望十年间,而士大夫声诗,率一变而为穷苦愁怨之语,而吾霁山(林景熙)诗亦若此。世丧文邪,文丧世耶?古今以杜少陵诗为诗史,至其长篇短章横骛逸出者,多在流离奔走失意中得之。……吾是以重有感于诗之变也。”^[2]

正因为宋末士子所面临的是异族铁骑的无情蹂躏,这自然会使他们联想起唐朝“安史之乱”时期胡人肆意屠戮焚掠的残酷情景,并由此而对在这场社会变故中念念不忘君国和人民的“诗圣”杜甫产生了深深的景仰之情。他们正是在“流离奔走失意中”深深意识到,此时此刻,人们十分需要提倡杜甫的忧国忧民精神,民族和国家比杜甫的时代更需要呼唤起士人的气节,作为士人则更应该义不容辞地以手中饱蘸的血泪之笔去记录、评判这个多灾多难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林景熙在遭

[收稿日期] 2000-05-24

[作者简介] 方勇(1956-),男,浙江浦江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先秦文学和宋诗研究。

逢鼎革之后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去做的,所以他说:“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水。”^[3]谢枋得在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也开始“爱诵杜陵诗”^[4],所以,他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诗歌数量既多,内容又以反映动乱的现实为主,风格也沉郁顿挫,多与老杜“诗史”有共通之处。汪元量早年的诗作内容相对单薄,但身经乱离之后,便对杜甫及其诗歌有了完全不同于往日的认识:“少年读杜诗,颇厌其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5]他既积极地以杜甫的爱国思想鼓舞自己,在诗歌创作的艺术形式方面又有意识地效法杜诗,“近法秦州体,篇篇妙入神”^[6],于是写成了一部“其愁思壹郁不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的“宋亡之诗史”^[7]。舒岳祥对前代诗歌体派风格的推尊本来是不主于一家的,但由于他晚年所目睹的民族国家的巨大变故和个体所经受的不幸遭遇,实有过于历史上许多困穷诗人所见所闻所经受者,这就使他对处于国家危亡多事之秋而念念不忘君国苍生的杜甫及其诗歌的价值逐渐加深了认识,并进而达到“情有独钟”的地步,所以他说“平生欲学杜,漂泊始成真”^[8],“燕骑纷纷尘暗天,少陵诗史在眼前”^[9],而当此之时,“唐体派家俱可捐”,只要“着力”于“少陵史诗”(同上)就可以了,因而,杜甫的“诗史”精神在他这里得到了大力弘扬。而作为宋末最为光彩夺目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对杜甫“诗史”精神的大力弘扬,却是别开生面地表现在“集杜”之上的。

集句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创作形式,它的起源较早。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云:“集句诗者,杂集古句已成诗也。自晋以来有之,至宋王安石尤长于此。”据吕祖谦所辑《宋文鉴·诗·集句》载,稍晚于王安石的孔平仲,甚至还专集杜甫诗句写成了《集杜诗句寄孙元忠》一诗。大致说来,这些集古句而成之诗多为调侃戏谑之作。然而到了文天祥,集句则成了专集杜句以成“诗史”的一项严肃的创作活动。文氏曾撰《集杜诗》一部,凡二百首,皆五言二韵,专集杜句而成。前有《自序》云:“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10]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天祥的忧国忧民之心和忠爱之情、悲愤之气,皆无一不与杜甫息息相通,故遂集杜句以描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各种人和事,而在表现形式上,简直如同己出,不愧是一部备受世人推许的好“诗史”。清四库馆臣谓其“每篇之首,悉有标目次第,而题下叙次时事,于国家沦丧之由,生平阅历之境,及忠臣义士之周旋患难者,一一详志其实,颠末粲然,不愧诗史之目。”^[11]文氏在狱中时,还应汪元量之求而集杜句以成《胡笳十八拍》,与汪氏共商略之(见文氏《胡笳曲序》)。此后,南宋遗民故老集杜句者蔚成风气。即使不是专集杜句的,也大都与文天祥的精神有所相通。如方凤有《三吴漫游集唐》七言绝句十首,清初张燧引吴伯能评曰:“宋瑞《指南》一稿,多集杜句,若出己吻,而先生遥为声应,唱予和汝,更觉凄然。”^[12]张庆之则“泊国亡,集杜诗,备述天祥平生大节”^[13],亦不愧诗史之目。

所谓杜甫“诗史”,唐人认为其特征在于“以时事入诗”,即:“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4]宋人的认识比唐人更进了一步,如胡宗愈在《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中说,杜诗之所以被“学士大夫谓之‘诗史’”,就在于其“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15]文天祥也认为,“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因此,在宋末士人看来,所谓杜甫“诗史”精神,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心、抑扬褒贬之意皆粲然可见,使千载之下的读者都能感知到诗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二是以写史的笔法写诗,诗人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去记录并评判自己所处的那个多灾多难时代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让后人永远从中记取悲惨的历史教训。如方凤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杜诗的真正价值,并努力把这种思想认识贯彻到自己的

创作实践中去的,故后人谓“其诗亦危苦悲伤,其殆有得于甫者非邪?”^[16]汪元量将“可诧、可惊、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于诗”^[17],既用来表达自己的痛愤之情,又用来告诉后人蒙古贵族是如何蹂躏我中华大地的,故人们亦谓其诗“愁思壹郁不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7]。关于这些,我们可以从舒岳祥的诗歌作品中看得更为明白。

诚然,当诵读舒岳祥诗作的时候,我们首先可以体味到其中所充满着忠愤感激、幽忧切叹之意,与杜甫的“诗史”精神完全可以相通。大致说来,舒氏的忠愤感激、幽忧切叹之意,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得以抒发的:一是叹国失君辱。如《杜鹃花》借古蜀王杜宇失国的故事云:“杜陵野老拜杜鹃,念渠蜀王身所变。我今流涕杜鹃花,为是此禽流血溅。嗟哉杜宇何其愚,万事成败皆斯须。一桢黑白翻覆手,揖让放弑皆丘墟。汝初一身今百亿,凝滞结恋胡为乎?尔生不能存社稷,死怨谢豹何区区!至今有子不自保,寄巢生育非良图。”^[18]可见,作者在叹故国、思故君的同时,又不无作为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所应有的反思与责备之意。二是叹身历磨难。其《新历未颁遗民感怆》之一云:“故国山河成断绝,孤臣江海自飘零”。之二云:“寒气著人身似病,世途多故鬓如银。劫灰今信胡僧说,野燐多应战鬼新。兵甲纵横满天地,衣冠颠倒走风尘。”^[19]正是王应麟所谓“晚岁涉坎险,历蹇难,萍流蓬转,有陶杜所未尝”,而“固穷守道,皓皓乎白璧之全”^[20]者。三是叹生灵涂炭。如《乱定复过西溪》云:“不过西溪三十秋,乱馀重到泪双流。黄蒿满地青烟少,日暮驱车不敢留。”^[21]又《春雪》云:“呜呼!狐狸有屋尔得居,室中居人今在无。或言白骨如白雪,雪亦有仁遮白骨。”^[18]读之令人痛心万分。四是叹暴政之虐。其《自归耕篆畦见村妇》之九云:“妇啼如此苦,吏夺一何豪!尺布不得著,长年空自劳。剥衣聊贖命,覆体不生毛。念欲全家去,乾坤何处逃?”^[22]又《乐神曲》云:“污田稻子输官粮,高田豆角初上场。……巫公巫公告尔神,产穀不如多产银。驴载马驮车碌碌,免斫柘条行捶扑。”^[18]此处所反映的蒙元政权之不仁以及官吏之暴虐,正可与他在《陈仪仲诗序》中所述者互为佐证,并使千载之下的读者犹可知其世:“予亲值乱亡,有先人之菜田在,沦为民伍,遂执里役。晨起开卷,未数行,悍吏操棍曳索,蹶突灶奥,败思挠怀,呻吟即事,夜分犹未甘匕饭。城舆绎老,曷日免泥塗之辱耶?”^[23]

其实,舒岳祥岂止“幽忧切叹”而已,他无疑更像“少陵歌里哭”^[24]那样,以歌当哭来彻底宣泄自己胸中的悲愤之情。如从“避地身三到,伤时泪数行”^[25]、“安危治乱几番见,到此三年哭断魂”^[26]、“寻春曾作太平民,说著花时泪湿巾”^[27]、“曾对集英瞻衮冕,孤臣洒泪立东风”^[28]等等诗句,我们仿佛犹能看到这位故宋遗臣“自京国倾覆”后,“于极海之涯、穷山之巔,用其素所对偶声韵者变为诗歌,聊以写悲辛、叙危苦耳。”^[29]当然,无论是幽忧切叹,还是以饱蘸血泪之笔写悲辛、叙危苦,舒岳祥不止于一己伤穷悼蹇,更重要的却在于以遗臣应有的忠肝义胆去缅怀故君故国,以士大夫应有的本分去关注民族国家的命运,以诗人应有的襟怀去放眼天下苍生,以历尽坎险磨难者所具有的悲悯之心去同情所有的不幸之人,以遗民的满腔义愤去大胆揭露和斥责蒙元新政权的残暴统治。舒岳祥自谓“平生欲学杜,漂泊始成真”,其真谛应当在此。我们说他的诗作与杜甫“诗史”精神有相通之处,其关键也正在于此。

然而,舒岳祥所谓的“少陵诗史在眼前”,却是更侧重于从取材如史、笔法如史的高度去认同杜甫“诗史”的。因为在他看来,“咸淳无正史,德祐少完人”^[30],如果不加追记申述,何以使这段历史传于后世,以为明鉴?其《次韵正仲秋晚感兴》小序说:“每得正仲秋篇,必先铺叙所见闻,不必左史倚相之读坟典也。盖古事已有传之者,而新闻就泯,吾惧无述焉。恍因此而增长之,则咸淳德祐故老所传,犹可一二不没也。”并赋诗句云:“爱尔和诗添记事,愁来时解锦囊看。”^[19]说明他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宋末士人普遍的“以诗存史”的观念是一致的。

显然,在“燕骑纷纷尘暗天”和“寇盗”“旁午”的年代里,浮现在舒岳祥“眼前”的“少陵诗史”,主要应当指那些反映当时动乱现实的作品。其《自次前韵酬马奥诸丈见和》之一有句云:“乱离多少

事,史笔若为传。”^[22]说明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以“史笔”传写鼎革之际的“乱离”之“事”,让后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这无疑是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舒岳祥就援引史传的笔法,忠实地记录下了那个动乱时代里所发生的一幕幕悲惨情景。如其《晓霜成花,日色凄淡,炙背南檐,记所闻见》一开头就叙述说:“十月二十有二日,霜淞成花泥漉漉。黑旗一点飞过村,居民缩头那敢出。又闻鄞骑入连山,搜捕乡兵火炉室。台明隔岭易张皇,纷纷徙家藏穀实。”^[18]很明显,诗人无论是对时间、地点的处理,还是对故事情节的安排,都使用了史家的笔法。而《次韵袁伯长寄赠之作》^[31],则又显示了“史笔”叙事的另一些特征,即诗人以亲身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十分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系列动乱现实,而自己一家人的罹难,则是诗中铺叙的重点,可见其取材有如史家,运用笔法也同样有如史家。而且,为了尽可能增加这类“诗史”的容量,并使其叙事纪实具有一定的情节性,舒岳祥一般都采用了长篇歌行的形式。但它们又不是“传记文学之用韵者”,而是一篇篇在完全遵循诗歌自身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创作出来的纪实性诗歌作品。如作者陈述时事时,多夹叙夹议,且时时寓情感于叙述之中,凡此都可以见出作者的诗心所在。

为了进一步强化“诗史”的纪实叙事功能,从而更好地保存史实,宋末士人们还十分注重运用以下几种体裁形式:

(一) 联章组诗

杜甫曾以联章组诗来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宋末诗人继承了杜甫的这种艺术形式而有了重大突破。如汪元量为了记录爱国英烈们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和民族国家遭受不幸的伤心史,就尽最大努力来继承并发展这一艺术形式。汪元量的组诗《浮丘道人招魂歌》,即为“拟杜少陵《七歌》体制者”^[32]。汪元量拟作的目的,就在于以自己的春秋之笔,最忠实地记述下文天祥这位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他的组诗《醉歌》10首,所叙史实起于咸淳初年宋将吕文焕之把守襄阳,而终止于南宋满朝文武尽降元朝,是一部以饱蘸血泪的笔墨记录下的宋亡伤心史。与《醉歌》10首相配合,汪元量后来还写了组诗《越州歌》20首,无比悲愤地追述了德祐二年元兵入临安以后所发生的一幕幕惨剧,亦可以补正史之不足,使千载以下的人们犹能从中深深记取惨痛的历史教训。汪元量还创作了更大的组诗《湖州歌》,共98首,其纪事上与《醉歌》、《越州歌》相衔接,最后直写到三宫抵燕后的一系列情事;第1首至第6首写元兵入杭与宋室的投降;第7首至第68首写三宫赴燕及诗人在途中的见闻;第69首至第98首写三宫抵燕后的情事,不愧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宋亡之诗史。总之,汪元量不但继承了杜甫以联章组诗来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社会现实的艺术手法,而且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他所创作的组诗《浮丘道人招魂歌》9首、《醉歌》10首、《越州歌》20首、《杭州杂诗和林石田》22首、《唐律寄呈父凤山提举》10首、《竹枝歌》10首、《西湖旧梦》10首等等,无一不是以联章组诗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的诗史长卷。尤其是《湖州歌》98首,自元丞相伯颜率军驻扎皋亭山写起,一直叙述到亡宋三宫到达大都后的一系列情事,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是极为复杂而广泛的,但由于作者采用了灵活多变的叙述手法,既使其中的各首诗歌无论在内容或结构上都可以单独成篇,又使各个单篇都无不有机地统摄于这个组诗的整体之中,从而构成了一幅规模宏大、结构完整、叙事精详而内容异常丰富的宋末历史画卷,它标志着我国联章组诗的“诗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 以序代题

宋末士人运用以序代题这种文字形式,既不像以往诗题那样,仅是对诗作本文内容的简单概括,也不像一般小序那样,仅起着交代写作缘由和时间、地点的作用,而往往是一则内容完整的小传,或是对宋亡过程中某一历史事件的具体描述,具有十分明显的丰富、补充、印证诗作本文所述内

容的功能。前者如戴表元以序代题云：“《浴蚕沙溪水》一首，为上饶陈烈妇作。烈妇，信州上饶人，嫁同郡叶氏，年二十五生子，四龄而寡。丙子兵寇起，能以智全其家。岁饥，发粟赈贫，类大丈夫，慷慨知大节，非徒守闺门贞行而已。”^[33]后者如舒岳祥，他于德祐兵乱后最为善用此法。如他以序代题云：“丙子兵祸，自有宇宙，宁海所未见也。予家二百指，甌石将罄，避地入剡，贷粟而食，解衣偿之，不敢以渊明之主人望于人也。因读渊明《乞食》诗，和韵书怀，呈达善。”^[31]又云：“七月十五日，竟传有铁骑八百来屠宁海，人惧罹仙居祸，僦船入海，从鸱夷子游。余在龙舒精舍，事定而后闻之，幸免奔窜，深有羨于渔家之乐也，作《渔父》一首。”^[19]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使诗作本身体制短小，或抒情成分过多，但由于具有如此长的纪实性诗题发挥着铺垫、补充、印证的作用，诗中所述的诸多事实片断于是得到连贯，所抒发的情感也有了明确的指向，因而，整首“诗史”叙事纪实的基本特征也就得到了充分体现。下面试就舒岳祥这一大批“诗史”的题目与诗作本身之关系，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整个作品叙事纪实特征等作进一步的分类举例及探讨。

其一，以诗题叙事纪实，而让诗本文充分发挥其抒情功能。如他以序代题纪实云：“丙子兵祸，台温为烈。宁海虽经焚掠，然耕者不废。丁丑粗为有秋，但种秫者少以醉人为瑞物。吾亦似陶靖节，时或无酒，雅咏不辍也。八月初九日，连日雷雨，溪路阻绝，山房岑寂。此夕初霁，浊酒新漉，数酌竟，步秋树阴，潭鱼可数；望前峰，老枫数十株，已无色，白鸟飞番去来，是中有惠崇大年笔。家人遣两力来迎，因倒坐篮舆而归。人或问之，戏答曰：吾日莫途远，故倒行也。记以三绝。”接着的三首绝句，大致都是像“伤今兵乱后，人醉不如枫”（之二），“兴亡谁与吊，聊复快新晴”（之三）^[34]之类的抒情性文字。不过，由于这些文字所抒发的情感都可以与诗题所陈述的事实互为生发，并从这些事实中一一找到它们之所以被振荡、激发起来的缘由，于是，抽象的情感就具有了明确的指向性和具体的可感性，而承担抒情职能的诗本文也就体现出了一定的纪实性。

其二，以诗题为“大事记”，而让诗本文承担起抒情和摄取典型镜头的职能。如有诗题云：“去年大兵入台，仙居幸免，今冬屠掠无噍类，衣冠妇女相随俱北，闻而伤之，作《俘妇词》。”诗云：“初谓无兵祸，那知酷至斯！相看不敢哭，有死未知期。儿向草间没，夫随剑口离。琵琶犹带怨，况是作俘累！”^[22]诗本文在诗题“大事记”的基础上，通过选取“儿向草间没”、“夫随剑口离”两个具体而典型的事例，抒发了强烈的慷慨之情，从而使整个作品构成了一幅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能够广泛而典型地反映当时动乱现实的生动画面。

其三，让诗题与诗本文互为补充、生发和印证，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如诗题云：“七月望日避地省坑存思庵留题，时章林出白石，可为水晶，有旨差路县官同金玉提举差夫取凿，又宿兵守之。吏卒旁午，指予为上户，求鸡羊酒米油铁，无以应其求，且不堪其屡也，来避于此。予念自丁丑之乱，至此凡三避矣。僧旧屋更新，怅然有感，因赋之。”诗云：“去家无十里，过岭即他乡。避地身三到，伤时泪数行。高檐齐古树，新屋背斜阳。我欲相邻住，青山志未偿。”^[22]这里，诗题从纪实方面大大丰富了诗本文的叙事内容，诗本文则主要从抒情方面进一步抒发了诗题中的“怅然”之“感”。又诗题云：“过字韵诗，辱诸友联和，方菅度枯鄙以酬厚意，偶报北兵自瓯闽回，驱男女牛羊万计，入蛟湖、深峻，出独山，屯尚义，由童公岭以北，三日夜不休，闻之惊心，遂成阁笔。是月十四夜，对月感涕，遂即前韵以纪时事，奉呈诸友。”诗云：“麦倒桑折枝，山外花门过。牛亡主不归，妇去蚕未卧。在者哭空村，吞声谁敢大？盲眸临空崖，惊尘飞暗堞。川逝痛陵迁，春深悲国破。可惜此良宵，月轮升紫磨。”^[31]这里的主要特点是，诗题、诗本文通过分别选择不同的叙事角度，从而使两部分内容起到了互为补充的作用。

如果追溯渊源，杜甫的“诗史”已有以序代题的状况出现，然而非常少见，而且文字也比较简单。可是到了舒岳祥，这却成了他创作“诗史”时最为惯用的一种形式，而且文字大幅度拉长，并十分注意在叙事纪实过程中点明事情所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引起本人创作欲望的缘由。因此，如果

再加上他创作的其他各种类型的“诗史”,并按其中点明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对所有作品依次排列,便可以构成一幅具有明确编年和事情发生详细地点的长篇历史画卷。这幅画卷始于宋度宗咸淳末年诗人弃官归里前后对黑暗时政的描绘和批评,止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诗人溘逝前二日所赋《天门杂咏》对自己在饱经世事沧桑后走向人生终极时的感悟,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诗人可以依照时间递移的先后次序,将一个个具体画面动态般地展现给人们,而其中最为催人泪下的,则是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元兵侵逼和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寇盗蜂午两个时期,东南沿海一带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暴骨原野的几组悲惨镜头。

(三) 以序辅诗

本来,“序以建言,首引情本。”^[35]也就是说,按照传统的做法,序言仅仅是用来作为发端、交代创作动机和缘起的。但宋末士人却与前人不同,他们运用序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强化作品的叙事纪实功能,而将交代创作的动机、缘起等退到了次要的位置。如郑思肖曾赋《五忠咏》诗,分咏制置李公芾、丞相李公庭芝、察使姜公才、都统王公安节、随驾内嫔某氏。各首并有小序,或述其忠义大节,或纪其抗元业绩,皆可与诗中内容互相补充生发。又有《哀刘将军》诗:“万重围里脱兵氛,匹马勤王志不分。既抱忠贞仇敌国,莫于成败议将军。身前名照江南月,地下心衔塞北云。为痛英雄并消没,托诗为史笔传闻。”^[36]诗人明言,他创作的目的完全在于“托诗为史笔传闻”,让“英雄”们的可歌可泣事迹永存人间而不“消没”。但在短章之中,还须寄托诗人的感情,怎么可能完整地记录下“英雄”的事迹以及当时的斗争环境呢?于是作序一篇,以弥补其叙事之不足。这篇序言简直像出于史家的手笔,岂止有补于一首短小诗歌叙事之不足?千载之下,我们犹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以及部分细节,它确实起到了弥补史书记载之不足的作用。而像他的《二哨诗》,分吊陈宜中和张世杰,所作序言二篇,则叙事更为详尽细致,与诗作本身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叙事整体。与郑思肖一样,舒岳祥也十分重视运用以序辅诗的文字形式。如他的《归故园》序是这样写的:“余踪难明越,五迁至版坑棠溪,袁仲素兄弟邀馆其家,己丑六月十六日始就之。明年三月归闾风,寓于凤栖塘田舍。行视篆畦故物,无一存者,惟咸平古松及瑶池无恙耳。作《归故园》二首遗正仲。”其诗之一云:“千家桑梓兵馀痛,十世松楸火后悲。瓦砾成滩无鸟雀,荆蒿如杖有狐狸。咸平树在枝柯损,晚易书亡目录遗。半树瑶花微雨里,向谁寂寞泪将垂?”之二云:“辟兵辟寇走他方,六遍移家路转长。百醉与君同出处,五穷随我共行藏。柳花暗度谁家竹,燕子寒归何处梁。最羡刘家好男女,稳抛家事客原尝。”^[37]这样的序言与其说是为了“引情本”,倒不如说是用来丰富、补充、印证诗作本文所述内容的。要是没有它,诗中所陈述的事实片断就会显得凌乱而无所归属,从而影响到“诗史”所陈时事的完整性,给人以一种模糊和不真实的感觉。

(四) 以篇章之后所叙史实注诗

为了强化“诗史”的叙事纪实功能,宋末士人还首创了以篇章之后所叙史实来注诗的形式。如宋无有《吟吃集》一卷,“每事为七言绝句一章,凡一百一首,各叙其始末于诗后,如自注然。”^[38]今以其《贾琼妻韩氏》一首后所叙“始末”文字为例:“巴陵女子韩氏希孟,魏公五世孙,嫁为贾尚书子琼妇。岳州破,被虏之明日,以衣帛书诗,自投江而死。诗传人间,哀国亡身虏也”^[39]。显然,这与前面所说以序代题、以序辅诗等形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上述可知,宋末士子在经历了空前的鼎革动乱之后,对杜甫“诗史”精神有了比唐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在艺术形式方面,他们对杜甫“诗史”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汪元量主要用联章组诗手法创作出来的宋亡“诗史”长卷,舒岳祥主要用以序代题手法创作出来的反映宋末元初东南沿海地区动乱现实的“诗史”巨卷,则更成了我国“诗史”发展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参 考 文 献]

- [1] 戴表元. 剡源戴先生文集·方便君诗序(卷八)[Z]. 上海: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 1919.
- [2] 何梦柱. 潜斋文集(卷五)[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4.
- [3] 林景熙. 霁山文集·书陆放翁诗卷后(卷三)[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0.
- [4] 谢枋得. 叠山集·代赠杜按察(卷一)[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53.
- [5] 汪元量. 增订湖山类稿·阜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卷三)[Z]. 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4. 86.
- [6] 汪元量. 增订湖山类稿·杭州杂诗和林石田(之一, 卷一)[Z]. 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4. 17.
- [7] 汪元量. 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一·李珣书汪水云诗后[Z]. 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4. 188.
- [8] 舒岳祥. 阙风集·九月朔晨起忆故园晚景(卷五)[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7.
- [9] 舒岳祥. 阙风集·题潘少白(卷二)[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3.
- [10] 文天祥. 文山先生全集·集杜诗自序(卷一六)[Z]. 上海: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 1919.
- [11] 永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文天祥文信公集杜诗[Z].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92. 1408.
- [12] 方凤. 方凤集[Z].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1993. 60.
- [13] 陆心源. 宋史翼(卷三五)[Z].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91. 374.
- [14] 孟繁. 本事诗·高逸[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0.
- [15] 仇兆鳌. 杜诗详注·附录[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90.
- [16] 宋濂. 浦阳人物记[Z]. 金华丛书(民国补刊本).
- [17] 汪元量. 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一·刘辰翁湖山类稿序[Z]. 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4. 185.
- [18] 舒岳祥. 阙风集(卷二)[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4.
- [19] 舒岳祥. 阙风集(卷六)[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0.
- [20] 舒岳祥. 阙风集·王序(卷首)[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5.
- [21] 舒岳祥. 阙风集(卷九)[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0.
- [22] 舒岳祥. 阙风集(卷三)[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9.
- [23] 舒岳祥. 阙风集(卷一〇)[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7.
- [24] 舒岳祥. 阙风集·自次前韵酬马奥诸丈见和(之二, 卷一)[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4.
- [25] 舒岳祥. 阙风集·七月望日避地省坑存思庵留题……(卷二)[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7.
- [26] 舒岳祥. 阙风集·解梅嘲(卷二)[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4.
- [27] 舒岳祥. 阙风集·暮春书怀寄董正翁寺正(卷七)[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8.
- [28] 舒岳祥. 阙风集·牡丹(卷九)[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7.
- [29] 舒岳祥. 阙风集·跋王榘孙诗(卷一二)[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1.
- [30] 舒岳祥. 阙风集·少师丞相国公西涧先生挽歌(之二, 卷二)[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3.
- [31] 舒岳祥. 阙风集(卷一)[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5.
- [32] 汪元量. 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一·钱谦益水云诗跋[Z]. 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4. 188.
- [33] 戴表元.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七)[Z]. 上海: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 1919.
- [34] 舒岳祥. 阙风集(卷八)[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5.
- [35] 刘勰. 文心雕龙·论赋[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80.
- [36] 郑思肖. 郑思肖集·中兴集[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1991. 93.
- [37] 舒岳祥. 阙风集(卷七)[Z].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3.
- [38] 永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存日·宋无琬吃集[Z].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92. 1546.
- [39] 顾嗣立. 元诗选·初集戊[Z]. 北京: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7. 1294.

[责任编辑 徐 枫]